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出土神树纹玉琮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

摘要：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坑遗物埋藏层出土1件神树纹玉琮(K3qw:236)，其平面位置靠近三号坑南壁，紧邻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玉琮材质为透闪石—阳起石玉，整体呈较规整的方柱体，中有周正的圆孔，器表无节槽，有线刻纹饰，刻痕甚浅。玉琮四面均饰弦纹与窃曲纹条带，其中相对的两面各线刻一株神树，形象与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有颇多近似之处。其原先应为一件素面玉琮，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流传、磨损后，才被刻上纹饰。器物形制与齐家文化玉琮高度相似，无疑是受甘青地区文化影响的产物，甚至不能排除这件器物原本为齐家文化产品的可能。神树纹饰具有鲜明的三星堆文化特征，雕刻线条却又略显潦草，或说明玉琮在三星堆文化中尚未被视作礼器。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玉琮；神树；齐家文化

Abstract: A jade *cong* with sacred tree patterns (K3qw : 236) was unearthed from the burial layer of sacrificial pit No.3 at the Sanxingdui site. It was deposited close to the south wall of pit No.3, next to the bronze kneeling statue holding a *zun* vessel on its head. Made of tremolite-actinolite, it is a relatively neat square column with a circular hole in the middle. There are no grooves but some engraved decorations on its surface, the depth of which is very shallow. Each outer side of the *cong* is adorned with string patterns and Qiequ patterns (curved and hooked forms arranged in broad band, which is derived from animal patterns), while on two opposite sides a sacred tree is engraved, which are quite similar to the bronze tree unearthed from Sanxingdui site before. It is supposed that the jade *cong* was originally a plain one, and it was engraved with ornamentation after a period of circulation and abrasion. As the shape of the jade *cong* is highly similar to those from the Qijia Culture, it is undoubtedly a product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 of Gansu and Qinghai regions,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is artifact was originally a product of the Qijia Culture cannot even be ruled out. The sacred tree patterns on the jade *cong* hav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nxingdui Culture, but the lines are somewhat roughly engraved, which shows that jade *cong* might not be regarded as a ritual vessel in the Sanxingdui Culture.

Key Words: Sanxingdui site, Sacrificial area, Jade *cong*, Sacred tree, Qijia Culture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是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先秦时期遗址之一。1986年，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相继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珍贵遗物。2019年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于一、二号坑所在的祭祀区新发现了三至八号坑（图一）。

三号坑（以下简称“K3”）是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最早被确认的一座，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上海大学联合发掘。发掘工作于2021年1月9日启动，3月16日完成坑底埋藏堆积的揭露，10月23日结束。K3位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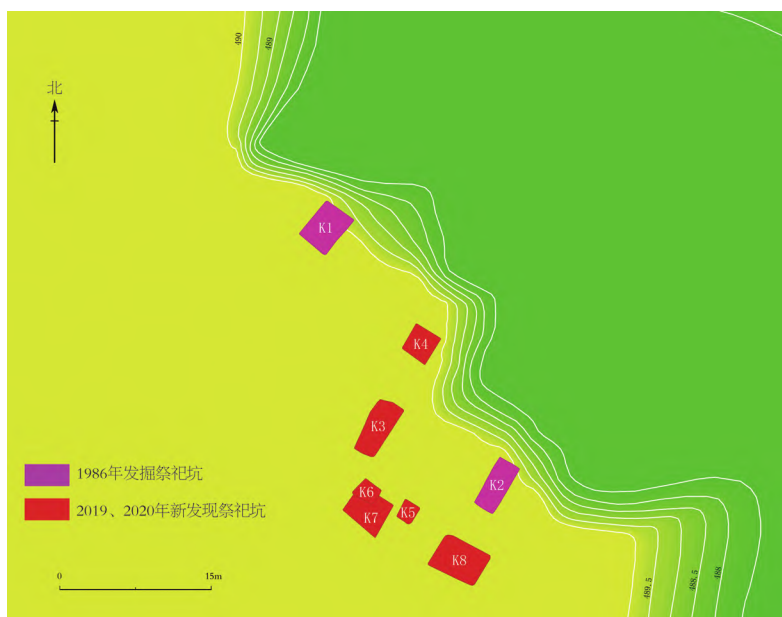
二号坑之间，地理坐标为北纬 $30^{\circ}59'37''$ ，东经 $104^{\circ}12'2''$ ，平面近长方形，长轴方向北偏东 30° 。长5.8、宽2.14~2.77米，坑底距坑口1.82~2.02米，开口面积14.1平方米。经初步统计，K3已编号的遗物有2686件，其中较完整的器物1293件。大部分遗物出土于坑底埋藏堆积，较完整遗物包括铜器764件、金器104件、玉器207件、石器88件、陶器11件，象牙104根，骨角器、海贝等15件。目前整理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K3出土遗物中，编号K3qw:236的神树纹玉琮非常罕见。本文将介绍这件文物的基本情况，并提出一些初步认识。

一 出土情况

神树纹玉琮出土于K3坑底埋藏堆积，平面位置接近K3南壁，紧邻青铜顶尊跪坐人像^[1]，埋藏深度距坑口1.78米。玉琮南北向平置于K3坑底，顶部朝向K3北壁，被发现时大半已陷入生土。K3底部未经处理，土质较为松软，玉琮很可能是在长期埋藏过程中被挤压下陷，而导致了上述情况（图二）。

2021年7月23日，玉琮被顺利提取出坑。



图一 三星堆遗址一至八号坑分布示意图



图二 K3 器物埋藏情况

二 形制与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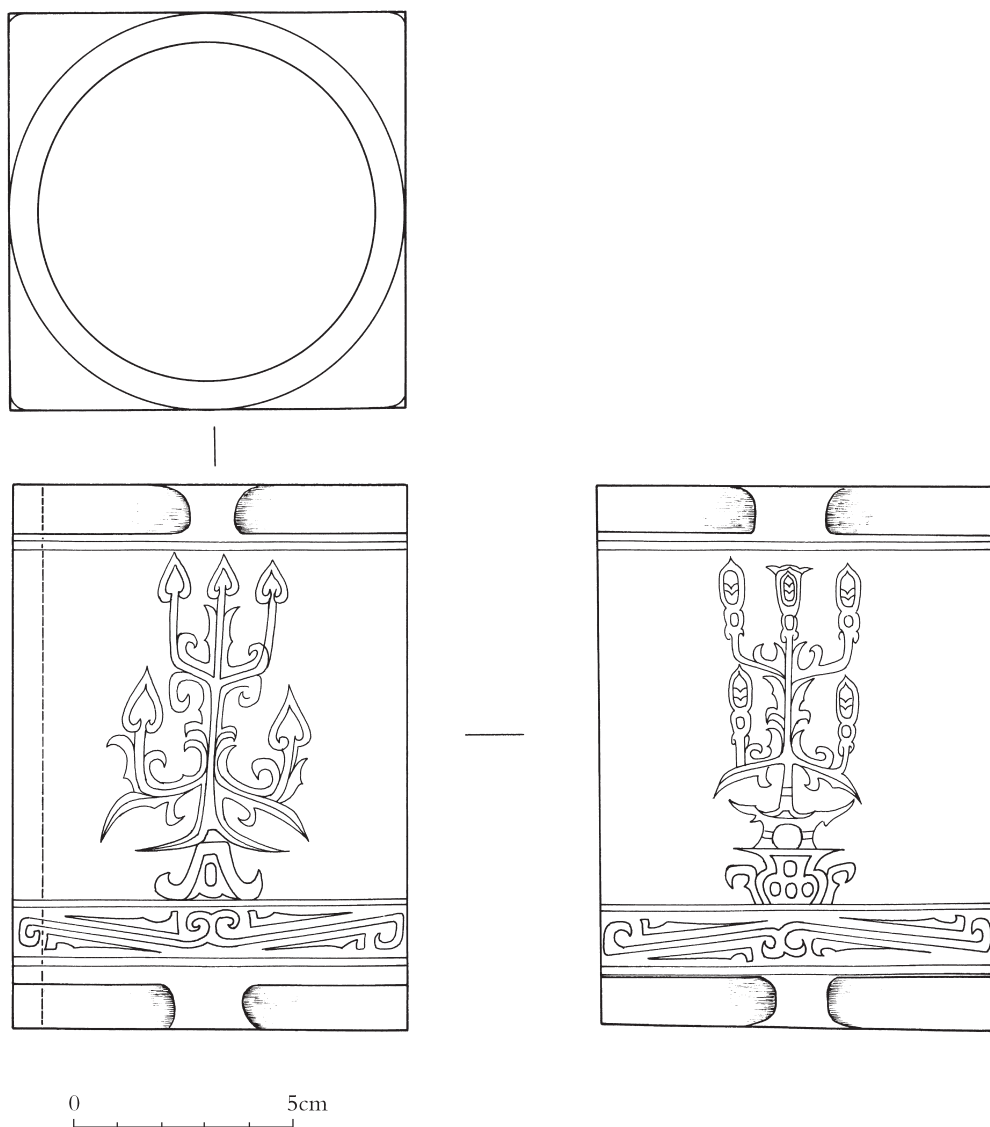
神树纹玉琮高12.5、上射径9.1、上射高1.1、下射径9、下射高1.2、孔径7.7厘米。玉色青白泛灰，不透明，表面有细密的裂缝，局部受沁呈黑色。器物整体呈较为规整的方柱体，中有周正的圆孔，底面略有倾斜，并不完全水平，故其直立时姿态不完全竖直。射壁较薄，厚度不及射高。琮面无节槽，有线刻纹饰。器表和孔壁打磨精细、光滑（封三；图三）。

发掘团队利用拉曼光谱仪对玉琮进行了无损物相分析。仪器型号为HORIBA公司生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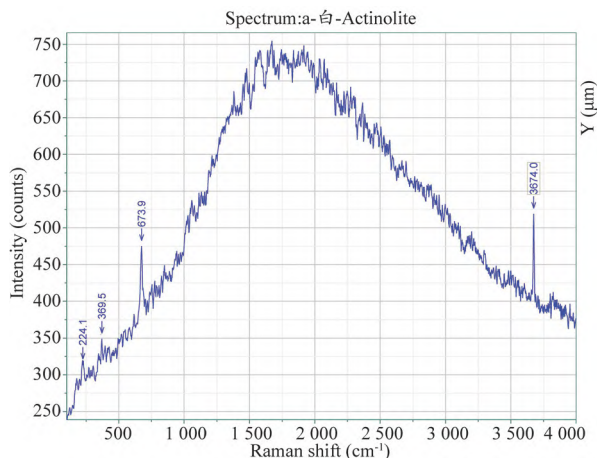
XploRA PLUS，激发激光为785nm。测试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中心完成，操作环境稳定。检测结果见图四。经比对，玉琮材质应为透闪石—阳起石玉。

玉琮四面均线刻纹饰。每面接上射处线刻弦纹二周，近下射处则有弦纹四条，分两组，组间饰两条横卧的“S”形窃曲纹，窃曲纹一端相连，弦纹与窃曲纹间的空隙处以近横长三角形的纹饰填充。器物近下射处的纹饰条带宽1.5厘米。

玉琮相对的两面各加刻树形图案一幅，两树形态略有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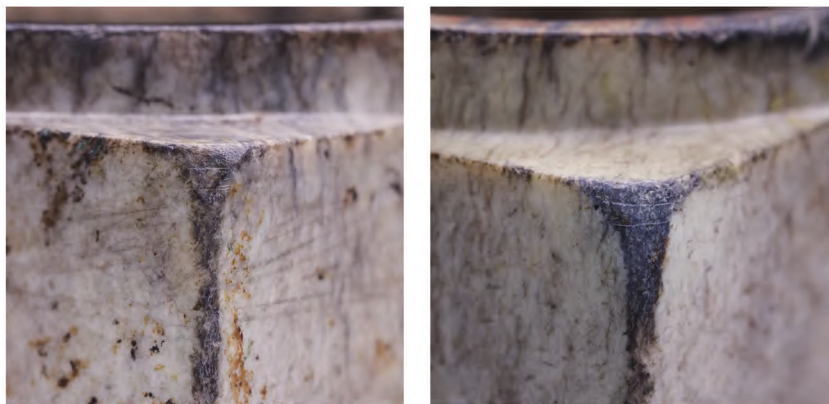
图三 K3 出土神树纹玉琮（K3qw：236）



图四 神树纹玉琮拉曼光谱图

一株高8厘米。底座呈“几”字形，树干底部分叉，落于底座之上。树干连接树枝5条，其中两枝自树干中部向两侧引出，后弯曲向上，另三枝则位于树干顶部，呈三叉形。树干中部两枝体量大于树顶三枝。各枝顶端均呈心形，或象征花蕊；树枝两侧则有数量不等的弯曲分叉，应象征枝叶。

另一株同样高8厘米。底座形态更加复杂，分为两层，下层呈“酉”字形，形似大口尊，两侧附弯钩状图案，似为尊的扉棱；上层呈“兀”字形。树干底部同样分叉，落于底座上层。此树亦有树枝5条，各枝布局与前树相同，但体量基本一致。树枝顶部形态更为复杂，系由上大下小的两个长椭圆形图案组合而成，上部椭圆形中各刻画两道近“V”形纹饰，中部树枝顶端呈铲形，其余四枝顶端收尖。各枝所附枝叶的布局、形态与前树类似。



图五 玉琮磨损处的线刻纹饰

三 初步认识

(一) 神树纹玉琮的制作过程

观察玉琮现状，可对这件器物的制作、加工过程作初步分析。

整件玉琮系将整块玉料切割、加工为长方体，再在此基础上打孔，并将两端四角切削以形成射部。器物整体经过较细致的打磨，表面平整而光滑。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器物棱角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磨损。

器表纹饰均系线刻而成，刻痕甚浅，一侧树枝纹刻痕甚至浅至肉眼观察较为困难的程度。从纹饰的形态判断，弦纹、窃曲纹条带与神树图案应是同时被刻画至玉琮表面。

值得注意的是，玉琮磨损处，表面同样有弦纹穿过（图五），考虑到此器纹饰雕刻甚浅，可以排除器物表面损耗后线刻犹在的可能性，故而不难得出结论，即玉琮在被施以纹饰前已有磨损。换言之，玉琮以素面的形态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流传，导致棱角已不再分明，其后才被刻划纹饰，成为独特的神树纹玉琮。

至于玉琮表面的黑色沁，则应是被放置入坑后，经长时间埋藏形成的。K3埋藏层填土中夹杂炭屑的现象较为普遍，坑内出土的其他玉器也存在受沁发黑的现象。

(二) 神树纹玉琮的来源

三星堆遗址出土玉器中，玉琮数量较少。1930年代燕家院子发现的玉石器中，包含玉琮5件（图六：1~5）^[2]；仓包包祭祀坑曾发现小

石琮1件，因故未提取^[3]；三星堆祭祀区一号坑^[4]、四号坑各出土玉琮1件（图六：6、图七）。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琮数量则较多，“梅苑”地点出土有玉琮24件^[5]。上述玉琮多为素面，就形态而言，K3出土的神树纹玉琮更接近四川博物院藏品A110485（图六：4）与金沙遗址出土玉琮



图六 三星堆、金沙遗址及其他地区所见玉琮

1~5. 三星堆遗址 1930 年代出土玉琮 [(3·1) 441、(3·1) 226、(3·1) 113、A110485、A41] 6.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玉琮 (K1 : 11-2) 7. 金沙遗址出土玉琮 (2001CQJC : 651) 8、9. 甘肃临洮、静宁出土齐家文化玉琮 (1~7 分别采自《玉汇金沙: 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 第 123、124、124、127、126、125、129 页; 8、9 分别采自《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 15 卷, 第 31、38 页)

2001CQJC : 651 (图六 : 7)。

朱乃诚认为“三星堆遗址中, 月亮湾燕子院子出土的玉琮、玉璧和一号祭祀坑出土的玉琮, 都是齐家文化的作品”^[6]。这一说法值得重视, 齐家文化玉琮中, 确有不少与神树纹玉琮形制相似的例证 (图六 : 8、9)。这些齐家文化玉琮无论在整体形态, 还是射部等细节的处理方式上, 均与K3发现的神树纹玉琮高度一致。由此可以推知, 即使神树纹玉琮并非齐家文化的产物, 也是深受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甘青地区文化

影响的产物。

另一方面, 上文业已指出, 神树纹玉琮系在一件经过流传、磨损后的素面玉琮上加刻纹饰而来的产物, 亦即从玉琮最初制作到被古蜀先民施以纹饰, 应有一段时间间隔。诚然, 这一时间间隔的跨度目前难以探明, 但确也增加了此件器物最初由齐家文化先民制作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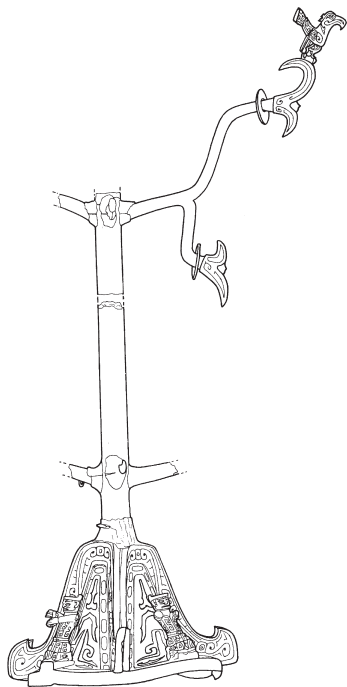
(三) 玉琮的神树纹饰

神树纹饰无疑是K3出土的这件玉琮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图七 三星堆四号坑出土玉琮 (K4qw : 43)

玉琮神树形象与三星堆出土青铜神树有颇多近似之处。整体形态上，玉琮神树纹样更接近二号坑出土的二号青铜神树（图八）；纹样中的“几”字形树座则与二号坑出土的一、二号神树异曲同工；玉琮神树的双长椭圆形花蕊，亦能在K3出土遗物中找到相似的实物例证（图九）。这种相似性，暗示玉琮神树纹样与青铜神树，很可能源自古蜀文明中的同一蓝本，两者分别是古蜀先民理念中神树的二维与三维表达。另外，玉琮神树纹样与青铜神树的诸多相似性，并不能说明玉琮纹样是借鉴、模仿青铜神树的结果，二者可能皆是源于古蜀先民创造的同一神树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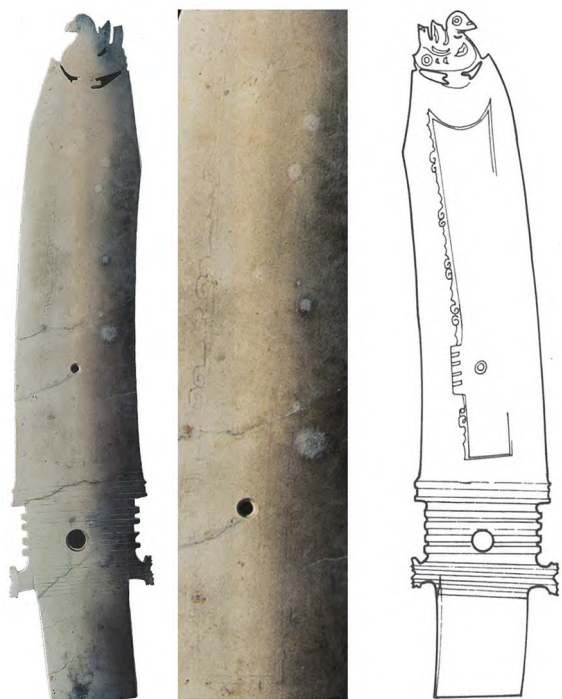
图八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二号青铜神树 (K2② : 194)
(采自《三星堆祭祀坑》，第220页)

另一方面，以线刻形式对玉器进行装饰的做法在三星堆出土玉器中亦有发现，最为著名、图案内容最丰富者莫过于二号坑出土的“祭山图”玉璋（图一〇），刻画有人物、山峦等形象。此外，三星堆一号坑还出土了刻有牙璋图案的戈形牙璋（图一一），在紧承三星堆文化的金沙遗址发现有线刻跪坐人物肩扛象牙图案的玉璋（图一二），它们也是此类玉器的代表。而在K3中，另一件重



图九 K3出土青铜树枝 (K3qw : 823)

图一〇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祭山图”玉璋 (K2③ : 201-4)
(采自《三星堆祭祀坑》，第361、572页)



图一一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线刻玉璋 (K1 : 235-5)
(采自《三星堆祭祀坑》，第 81、532 页)



图一二 金沙遗址出土线刻玉璋局部 (2001CQJL10 : 16)
(摄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要玉器——兽面凤鸟纹玉座 (图一三)，亦满布线刻纹饰，系古蜀玉器之珍品。从线刻纹饰的角度，K3所出神树纹玉琮与上述几件器物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玉琮表面一道曲线往往由多道刻痕接续而成，线条显得潦草而凌乱。这种现象在其他几件有较复杂图案的线刻玉器上并不存在。这种差异的成因值得关注，其是器物加工年代早晚的体现，还是工匠水平差异所造成，抑或与器物性质有关，值得进一步推敲。

《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中“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7]的记载



图一三 K3 出土兽面凤鸟纹玉座 (K3qw : 162)



图一四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持璋铜人 (K2③ : 325)
(采自《三星堆祭祀坑》，第 560 页)

广为人知，琮作为一种礼器的认识亦被普遍接受。不过，《周礼》成书较晚，约在战国时期，对玉器的记载也有理想化色彩^[8]。显然，今人不应基于晚期文献记载，即将三星堆玉琮认定为礼器。

已发现的三星堆文化玉器中，璋、璧、戈等器类数量较多。其中，璋作为礼器的性质最为明确，三星堆二号坑出土有持璋铜人，应即古蜀先民在祭祀一类的重要场合手持璋参加活动的情形（图一四）。反观神树纹玉琮，若将之视作礼器，则存在三方面问题：第一，玉琮数量稀少，三星堆文化中，玉琮数量远少于璋、璧等礼制色彩较为明确的玉器；第二，如前文所述，三星堆文化玉琮很可能并非本地制作，而是年代更早的齐家文化产品，这种现象不见于三星堆其他玉礼器；第三，神树纹玉琮上的纹饰刻画较为潦草、随意，若将其作为礼器，显得不够庄重、严肃，反观用作礼器的玉璋，几件有线刻纹饰者，线条均清晰明了，与神树纹玉琮差异明显。综上，琮是否已在三星堆文化与玉器使用相关的礼制中占据固定位置，尚待讨论。换言之，K3神树纹玉琮可能并不具有礼器的性质^[9]。对三星堆时期的先民而言，玉琮可能仍只是某种珍稀的舶来品^[10]。

四 结语

神树纹玉琮无疑是三星堆祭祀区发掘中的重要发现之一。这件器物是古蜀地区与甘青地区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而其上的神树纹饰则有鲜明的古蜀文明烙印，再次彰显了神树这一独特意象在三星堆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关于这件器物，仍有不少内涵可供发掘，相信结合更多考古发现，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围绕神树纹玉琮可以结出更多精彩成果。

项目负责人：雷雨

发掘：冉宏林 徐斐宏 杨镇 乔钢

张童心 郑璐璐 法晓萌 韩长君

张顺利 夏才艺 黄砾苇 谷欢欢

胡攀蓉 廖述雯 许丹阳 段家义

摄影：江聪 郑璐璐

绘图：罗泽云

检测：蔡秋彤 郑璐璐

执笔：徐斐宏 法晓萌 冉宏林 雷雨

注释：

-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学院：《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 [2] 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有3件玉琮，四川博物院收藏有2件玉琮，未经规范报道。玉琮情况参见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第123~124、126~12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
-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报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第78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80~82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 [5] 朱章义、王方：《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琮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第4期。
- [6] 朱乃诚：《茂县及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四川文物》2020年第1期。
- [7] [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1390页，中华书局，1987年。
- [8] 孙庆伟研究认为《周礼·考工记·玉人》“对具体玉器的形制和相关用玉制度的描述过于量化和系统化”。参见孙庆伟：《〈考工记·玉人〉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考古学研究（四）》，第134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 [9] 刻纹形态或许也构成了我们分析兽面凤鸟纹玉座具体功用的一个角度。
- [10] 无独有偶，与三星堆“祭祀坑”同时代的殷墟文化中，玉琮很可能也不是一种专门制作的器物，也没有明确的礼器性质。详见朱乃诚：《殷墟妇好墓出土玉琮研究》，《文物》2017年第9期。

●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神树纹玉琮

